

林语堂



学术年谱

A Chronology of
Lin Yutang's
Academic Activities

郑锦怀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林语堂



学术年谱

A Chronology of
Lin Yutang's
Academic Activities

郑锦怀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语堂学术年谱/郑锦怀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615-7022-7

I. ①林… II. ①郑… III. ①林语堂(1895—1976)—学术研究—年谱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0647 号

出 版 人 郑文礼

责任编辑 章木良

美术编辑 张雨秋

技术编辑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ress@126.com

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开本 787 mm×1 092 mm 1/16

印张 34.75

插页 2

字数 721 千字

版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凡 例

一、本年谱的编写,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秉持尊重历史事实的严谨态度,实事求是地挖掘、整理和利用林语堂生平、著译、影响等诸多方面的史料,力求准确、客观、全面而系统地呈现林语堂一生的学术活动、成就与影响。

二、本年谱所称的“学术”涵盖林语堂进行的创作(包括文学、绘画、书法等)、翻译、演讲(包括讲座、谈话等)及其接受的采访等相关活动。

三、本年谱重点考察林语堂生前的学术活动,包括其汉英双语创作与翻译活动,及其英文著译成果的汉译情况,并酌情介绍在他逝世后出版的各种重要的译本、文集、文选、全集等。在资料允许的前提下,本年谱将尽量说明各种译作的对应原作。

四、在资料允许的前提下,本年谱将尽量梳理林语堂著译成果在汉语与英语文化圈的传播与影响。尽量介绍单篇文章在1949年以前的转载、收录情况。囿于史料,本年谱暂不梳理林语堂著译成果在非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情况。

五、本年谱包括“正谱(1895—1976)”与“附录:林语堂逝世以来重要作品与研究论著编年”两部分。后者介绍了在林语堂逝世后发表或出版的若干遗作,以及各种重要文集、选集、全集与研究论著等。

六、为统一起见,本年谱采用公元纪年,以时间为序进行考录,无日可考者系旬或月,无旬或月可考者系季,无季可考者系年。在介绍林语堂的著译成果(包括其英文著译成果的汉译版本)时,以其发表或出版时间为准。在资料允许的前提下,本年谱亦将说明林语堂著译成果的撰毕或译就时间。

七、本年谱尽量据第一手史料对林语堂的著译成果加以考录,并在必要时做简要介绍。原文如用繁体字,则一律转换为简体字;原文如有无法辨识之字,以方框符号“□”表示;如有明显讹误、脱落之处,用【 】将正确之字置于其后;有需要补充解释之处,则加()说明。

八、如果未能掌握第一手史料,本年谱则根据可信度与准确性较高的间接史料进行介绍。参考或引用之处均注明出处。

九、民国期刊的期次或曰“期”,或曰“号”,或曰“集”,或曰“辑”等。对此,本年谱将尽量保留其原貌,并不硬求统一。

十、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民国时期期刊封面、目录与正文中的题名和署名经常存在差异。对此,本年谱亦将尽量说明清楚。题名方面,以正文题名为主,如果目录页题名与正文题名有差异,则补充说明目录页题名。署名方面,以正文署名为主,如

果目录页署名与正文署名有差异,则补充说明目录页署名。间或补充说明封面上的题名与署名情况。示例如下:

1. 目录题名与正文题名相同,目录署名与正文署名亦相同:

所撰(译)《×××》载《××××》第×卷第××期,署名“×××”。

2. 目录题名与正文题名不同,目录署名与正文署名则相同:

所撰(译)《×××》载《××××》第×卷第××期,署名“×××”。目录题名为《××××》,正文题名为《××××》。

3. 目录题名与正文题名相同,目录署名与正文署名则不同:

所撰(译)《×××》载《××××》第×卷第××期。目录署名“×××”,正文署名“××××”。

4. 目录题名与正文题名不同,目录署名与正文署名也不同:

所撰(译)《×××》载《××××》第×卷第××期。目录题名为《××××》,目录署名“×××”,正文署名“××××”。

十一、报纸通常没有提供目录。因此,本年谱在介绍报纸所载文章的署名情况时只写“署名×××”,而不写“正文署名×××”。示例如下:

所撰《×××》载《××××》第×版,署名“×××”。

十二、关于林语堂英文作品的汉译版本,一般称“所著(撰、编、译)《×××》(××××译)”。示例如下:

所著(撰、编、译)《×××》(××××译)由××(出版地)的××××(出版机构)出版,列入“××××”丛书,至××××年××月××日再版。

序 言

一、写作缘起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漳州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与编辑出版家。

林语堂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1916年夏毕业后赴清华学校执教。1919年秋,林语堂赴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攻读比较文学,后因经济问题转赴德国耶拿大学(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一般简称 Universität Jena,英文校名为 Jena University)与莱比锡大学(Universität Leipzig,英文校名为 Leipzig University)深造,并于1923年春在莱比锡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他随后归国,入北京大学担任英文及语言学教授。他在古代汉语研究、方言研究、索引与检字法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发表了《国语罗马字拼音与科学方法》《汉字中之拼音字》《支脂之三部古读考》等一系列文章,并且出版过《语言学论丛》(1931)等书。可惜他后来转行,其语言学研究功底几乎都荒废了。到了晚年,林语堂重新拾起了对语言学的兴趣,在报刊上发表了若干文章,并且编纂了一部很有影响力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Lin Yutang'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Usage*, 1972)。

林语堂以中英文双语创作见长。他创作过引发巨大社会反响的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也曾因为大力提倡和积极创作幽默、闲适的小品文而名噪一时,并结集出版了《翦拂集》(1928)、《大荒集》(1934)等书。他还曾在《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上主持“小评论”(“The Little Critic”,有时印作“Little Critic”)栏目,发表了大量英文小品文与译文,后编入 *The Little Critic: Essays, Satires and Sketches on China (First Series: 1930—1932)* (《英文小品甲集》, 1935)、*The Little Critic: Essays, Satires and Sketches on China (Second Series: 1933—1935)* (《英文小品乙集》, 1935)、*Confucius Saw Nancy and Essays About Nothing* (《子见南子及英文小品文集》, 1937)、*With Love and Irony* (《讽颂集》, 1940)等书,影响很大。这些作品引起了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的注意。在赛珍珠的鼓励与支持下,他用英文写出《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1935),畅销一时。后来,他受邀赴美专事写作,完成了《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林语堂学术年谱

1937)、《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 1939)、《讽颂集》(*With Love and Irony*, 1940)、《风声鹤唳》(*A Leaf in the Storm*, 1941)、《啼笑皆非》(*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1943)、《枕戈待旦》(*The Vigil of a Nation*, 1944)、《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 1947)、《朱门》(*The Vermilion Gate*, 1953)、《远景》(*Looking Beyond*, 后改名 *The Unexpected Island*, 1955)、《武则天》(*Lady Wu*, 1957)、《红牡丹》(*The Red Peony*, 1961)、《赖柏英》(*Juniper Loa*, 1963)等一系列英文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并被转译成德文、法文、日文等诸多外语,至今仍然影响着外国读者的中国观。晚年,他应马星野之邀在台湾《中央日报》上发表了大量随笔,最终结集为《无所不谈合集》(1974)。

林语堂在翻译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英译汉方面,他主要译有蓝孙姆(Arthur Ransome)的《国民革命外纪》(1929)、罗素夫人(Dora Russell)的《女子与知识》(1929)、奥格涅夫(N. Ognyov)的《新俄学生日记》(与张友松合译,1929)、王尔德(Oscar Wilde)等人的《新的文评》(1930)、萧伯纳(Bernard Shaw)的《卖花女》(1931)、洛德(Everett William Lord)的《怎样训练你自己》(1939)、马尔腾(Orison Swett Marden)的《成功之路》(1939)、笥斯特娄(Joseph Jastrow)的《心理漫谈》(1939)等。在汉译英方面,他主要译有《英文林语堂时事述译汇刊》(*Letters of a Chinese Amazon and Wartime Essays*, 内含谢冰莹的《从军日记》,1930)、《英译老残游记第二集及其他选译》(*A Nun of Taishan and Other Translations*, 1936)、《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 1938)、《浮生六记》(*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1939)、《有不为斋汉英对照冥寥子游》(*The Travels of Mingliaotse*, 1940)、《汉英对照有不为斋古文小品》(*Gems from Chinese Literature*, 1940)、《中国与印度的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 1942)、《英译重编传奇小说》(*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 1948)、《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 1948)、《寡妇、尼姑与歌妓:英译三篇小说集》(*Widow, Nun and Courtesan: Three Novelettes from the Chinese*, 1951)、《古文小品译英》(*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1960)等。他赴美后完成的汉译英作品影响尤大,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

林语堂亦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编辑出版家。他创办过《论语》(1932)、《人间世》(1934)、《宇宙风》(1935)、《天风》(1952)等刊物,吸引了大批名家投稿,影响很大。民国期间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论语派”便是依托《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种刊物而形成。其成员包括林语堂、郁达夫、邵洵美、陶亢德等人,主要从事小品文创作,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撰有《中国新闻舆论史》(*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1936),这部作品被誉

为中国舆论学研究的开山之作,甚至还“对美国的汉学研究发生过影响”^①。

林语堂曾评论自己为“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此语恰如其分地总结了他一生对中讲西、对西讲中的跨文化活动。当然,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根本无法呈现林语堂一生当中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全部成就。想要更深入、更全面、更细致、更准确地呈现林语堂的生平与成就,就必须持续不断地挖掘和整理第一手史料。这恰是本书的写作缘起。

二、学术史梳理

(一)历年国家社科项目立项情况

迄今,以林语堂为研究对象的各级各类课题数不胜数,但国家社科项目极少。肖百容的“林语堂小说研究”(13BZW109)、李平的“林语堂创作与翻译的互文关系研究”(13BYY028)、卞建华的“林语堂作品的中国文化变译策略研究”(14BYY012)、宋丹的“日藏林语堂《红楼梦》英译原稿整理与研究”(16CWW006)等项目侧重于从不同视角研究林语堂的创作与翻译活动,但对其生平史料关注不够。张桂兴的“林语堂文献整理与中英文资料库建设”(14BZW105)侧重于整理林语堂的著译成果,并且已经通过政府招标确定由北京三联书店推出一套全新的《林语堂全集》,但在林语堂生平史料挖掘与整理方面尚无重大突破。

(二)国内外出版的林语堂年谱、简谱、年表、大事记

目前,国内外尚无正式出版的林语堂年谱单行本,但不少著作中附有详略不一的林语堂年谱、简谱、年表、大事记,如刘炎生的《林语堂学术行年简表》(1994)、杜运通的《林语堂年谱》(1997)、冯羽的《林语堂年谱》(日文/中文,2005)与《林语堂创作年表》(2006)、陈亚联的《林语堂年表》(2006)、张梁的《林语堂生平与文学活动大事记》(2009)、钱锁桥(Qian Suoqiao,原名钱俊)的“Chronology of Lin Yutang”(《林语堂年表》,2011)等。但这些成果在全面性与准确性方面尚有欠缺。

(三)国内外出版的林语堂传记

关于林语堂研究,以传记为多。林语堂本人用英文撰有《林语堂自传》(1935)、《从异教徒到基督徒》(1959)与《八十自叙》(1974)三种自传,均已译成中文。苏迪然(Diran John Shohigian)的博士学位论文“The Life and Times of Lin Yutang”(《林语堂的生平与时代》,1991)是少有的由欧美学者完成的林语堂传记,可惜并未正式出

^① 余英时:《试论林语堂的海外著述》,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第2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64页。

林语堂学术年谱

版,影响有限。中文传记方面,主要有林太乙的《林语堂传》(1989),刘炎生的《林语堂评传》(1994),万平近的《林语堂传》(1996),施建伟的《林语堂在大陆》(1991)、《林语堂在海外》(1992)、《林语堂传》(1999),王兆胜的《闲话林语堂》(2002)、《林语堂大传》(2006),李勇的《本真的自由:林语堂评传》(2005),陈亚联的《林语堂的才情人生》(2006),厉向君的《蜚声世界文坛的中国作家——林语堂》(2012),陈欣欣的《林语堂——孤行的反抗者》(2015),陆陆的《第一流的幽默家——林语堂》(2015)等。此类传记各有特色,但多以文采见长,在 firsthand 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方面仍有欠缺,未能对长期存在的某些以讹传讹之处进行辨析和纠正。

(四)国内外出版的林语堂著译目录

林语堂以其著译成就而闻名于世,故而已有若干国内外学者专门考录其成果。美国学者亚瑟·詹姆斯·安德森(Arthur James Anderson)的“Lin Yutang: A Bibliography of His English Writings and Translations”(《林语堂英文著作及英译汉书目录表》,1973)按时间顺序介绍了林语堂的英文作品,但只从1928年开始考录,并未包括林语堂早年在《约翰声》(*St. John's Echo*,常简称为*Echo*)等刊物上发表的英文作品,更未涉及其中文著、译、编成果。^①

台北市立图书馆郭碧娥与杨美雪合编的《林语堂先生书目资料汇编》(1994)与厦门大学图书馆朱立文编的《林语堂著译及其研究资料系年目录》(1995/2007)注重考录林语堂的中文成果,却将其大部分英文成果排除在外,且条目编排混乱,不便查阅。而且,这三种目录均非正式出版物,传播不广。^②

钱锁桥的最新成果“Bibliography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n Yutang”(《林语堂全集目录》,2017)中西并重,但分成“德文与德译汉作品”“中文作品”“英译汉作品”“英文作品”四个部分,并未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目录,而且条目描述不够具体,仍有错漏。^③

综上所述,有必要进一步挖掘和整理史料,编就一部《林语堂学术年谱》,以期较为全面、准确地呈现林语堂的学术活动、成就与影响。

① Arthur James Anderson, Lin Yutang: A Bibliography of His English Writings and Translations, *Bulletin of Bibliography and Magazine Notes*, Vol. 30, No. 2, April-June 1973, pp. 83-89.

② 郭碧娥、杨美雪:《林语堂先生书目资料汇编》,台北:台北市立图书馆,1994年;朱立文:《林语堂著译及其研究资料系年目录》,厦门:厦门大学图书馆,1995年;朱立文:《林语堂著译及其研究资料系年目录》,厦门:厦门大学碧海斋,2007年。

③ Qian Suoqiao, *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 407-462.

三、研究方法^①

自宋代吕大防编撰《韩吏部文公集年谱》、赵子栎编撰《杜工部年谱》始,年谱逐渐成为深受历代学者重视的记载历史人物生平的重要载体。^②近代,梁启超将年谱列为“人的专史”的五种形式之一。^③到了当代,年谱已经被视为一种非常经典的历史学研究方法。^④

古今中外,史料一直都是许多历史学家眼中的关键问题。在西方,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很早就提出,历史著述是否可信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可信的原始资料作为根据。^⑤以他为代表人物的兰克学派(Ranke School)支配西方史学界几达一个世纪之久,其史学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影响深远。

在中国,自司马迁而降,欧阳修、朱熹、顾炎武等名家都十分注重史料。到了现代,甚至出现了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强调史料高于一切。^⑥傅斯年曾经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英文校名 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留学多年,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1928年,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⑦他还任其仅剩的《史学方法导论》讲义之第四讲“史料论略”中指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史学便是史料学。”^⑧尽管对傅斯年提出的“史学便是史料学”之观点颇有微词,但中国历史学界普遍认同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比如,翦伯赞认为史料并不等同于历史,但他同时强调:“研究历史要有史料……最好的历史学家,没有资料,怎么能写出历史来呢?所以资料是重要的。”^⑨

① 笔者与岳峰教授合撰的《翻译史料问题》(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3期)专论翻译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但文中所论对于年谱编撰亦有较高的实践指导意义。此处有所引用、修订并扩充。

② 王学海:《关于年谱编撰的新思考——兼述陈鸿祥先生的〈王国维年谱〉》,《学海》1998年第2期,第93页。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7页。

④ 张涛:《年谱编撰、史料拓展与新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年谱与新文学经典化”研讨会综述》,《文艺争鸣》2016年第9期,第181页。

⑤ 陈勇、罗通秀:《西方史学思想导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4~106页。

⑥ 汤勤福:《中国史学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44页。

⑦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第一本第一分,第3页。另,该文发表时并无署名,但实为傅斯年所撰。

⑧ 傅斯年:《史料论略》,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⑨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12~13页。

史料大致可以分为直接史料(或称原始史料)与间接史料(或称转手史料)两类^①,但不同学者下的定义各有不同。比如,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莫米利亚诺(A. D. Momigliano)认为:“所谓原始史料,为目击者的陈述、文献(documents)以及事实自身的遗存,数者皆与事件同时。所谓转手史料,为史学家或编年家论述彼等所未及亲见的事件,仅凭传闻或直接或间接的参稽原始史料而来。”^②傅斯年则称:“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減……”^③

一般来说,直接史料最为可信、准确,间接史料则常存在错漏、不确、不全等问题。因此,理想的历史著述最好根据直接史料撰写而成,以便确保相关史述准确无误。但是,直接史料有时候孤立存在,没有旁证;而间接史料反倒是前人从直接史料中精心归纳而得。^④因此,对于史料的直接或间接、可信或不可信,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就年谱编撰而言,研究者至少应当关注以下几类直接史料:

1. 谱主正式发表或出版的著译成果

早期作品大多先刊登在各种报刊上,然后才被收入某种文集,或者推出单行本。不过,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作品被转录时常常会发生变化,跟其原初状态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作者或译者本人对文章(译文)进行修订,增加序跋乃至正文章节等。又如,编辑对文章(译文)进行删改,删除原序、原刊介绍或原刊编辑小记等内容。再如,由于排版与刊印的原因,出现文字错漏,等等。

另外,在近现代中国,许多著述都具有多种版本,或者是由同一个出版机构多次重印,或者是由不同出版机构在不同时期推出过印本。有时候,一些重印本或再版本没有标示其初版信息;有时候,不同版本的排版一致、内容相同;有时候,不同版本的页码编排有异、内容相同;有时候,不同版本的内容有所增删。总之,版本情况十分复杂。因此,在考察介绍某种著译单行本的时候,研究者最好以其原始版本(初版本)为根据。假若存在不同版本,各种版本之间又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那么研究者也应当据实加以描述,以保证史述的准确性。研究者需要了解书名、署名、出版时间与版次、丛书名称、书中收录的序跋、他人为之撰写的序言或导言、装帧情况、页码与价格等相关信息。

因此,研究者应当尽量搜集原始的报刊文章(译文)与著译单行本的初版本,以便准确呈现其原初面貌,并且从中发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①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

② 傅斯年:《史料略论》,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③ 傅斯年:《史料略论》,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④ 傅斯年:《史料略论》,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页。

2. 谱主的著译未刊本

有些人在完成某一作品之后,却无意将其拿去发表或出版;或者,有些人的作品一直没有获得机会正式发表或出版。于是,在其逝世之后,只有一些著述未刊本(主要是手稿、誊抄稿,也可能是打印稿)留存下来,但它们的命运各异。无名小卒的未刊本可能会被当成废纸回收,化成纸浆;而名家的遗作则可能会被某些个人或博物馆等机构收藏,得以保存下来。这些保存下来的著译未刊本亦是第一手史料,具有极高的价值。与此同时,一些名家逝世之后,其著述未刊本可能会由其亲朋与出版商整理出版。整理者可能会修正原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误用标点符号、弄错字母大小写、错别字等。经过整理后正式出版的著述单行本可能跟原稿略有差异,但一般亦可视为直接史料。

3. 谱主的演讲记录、访谈记录等

近现代以来,谱主可能会到各种机构(包括政府部门、各级学校、社会团体)、社交场合等发表演讲。有时候,谱主会事先准备好演讲稿;有时候,组织者或听众会将谱主的演讲内容(或梗概)记录成文。无论是谱主自己准备的演讲稿,还是他人的记录稿,都有可能拿到报刊上发表。谱主还可能接受各种媒体记者的采访,而访谈记录大多会在报刊上正式发表。这些亦可归为直接史料。

4. 谱主的日记、自传、学籍档案、往来信件与电报、书画作品等

从古到今,许多文人墨客都有写日记的习惯。近现代史上的不少作家亦有写日记的习惯,将自己的日常活动记录下来。这类日记中比较著名的有《胡适日记》《鲁迅日记》《周作人日记》等。它们记录了日记主人自己的著译活动、文章的发表或著述的出版、与其他作家的交流活动等,为后人提供了很宝贵的直接史料。但是,必须注意,有些谱主有事后补记的习惯。如果谱主过了很久才补记,那么他补记的内容可能不那么准确,需要加以辨析。

谱主本人撰写的自传包含了许多重要信息。但是,谱主动笔时多凭记忆、印象,而未细加查究原始资料,所以自传在准确性方面存有缺憾,需要辨析。

学籍档案保留了谱主求学期间的重要信息,包括姓名、籍贯、年龄、所学专业、学业成绩、奖惩信息等;往来信件与电报则呈现了谱主跟亲戚朋友、同事,乃至记者、编辑、出版商、读者等的交际情况;书画作品也蕴含了创作时间、创作缘由、赠送对象等信息。它们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谱主常有佚文存世。有些佚文连谱主本人或其直系亲属都没有存稿,或者根本就没有记录或给人留下印象。因此,研究者应当加强对谱主佚文的搜集、鉴别与整理。

至于间接史料,研究者至少应当关注以下几类:

1. 经过转录的谱主的著译成果

有时候,谱主的某种著译成果曾经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或由某个出版机构公开出版过单行本。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著译成果已经佚失不存,当前已经无法找

林语堂学术年谱

到原初版本,而只能在某些文集、资料汇编等找到其踪迹。这种经过转录的著译成果可能会由于人为因素而出现各种疏漏,比如文字印错、脱落、次序颠倒等等,但其可信度依旧很高,仅次于原初版本。

谱主的选集、文集、全集等收录的内容比较全面、系统,易于获取且使用方便,更是研究者必备的重要资料。

2. 书目索引

有些间接史料经由前人整理,已经比较系统、全面,同时也更容易获取,更便于利用。书目索引就是其中的一种。就现代作家研究而言,重要的书目索引包括北京图书馆编的多卷本《民国时期总书目》(1982—1996)、唐沅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1988)、贾植芳与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1993)、吴俊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2010)等。研究者可以从中找到许多很有价值的线索,极有助益。

3. 传记资料

传记资料(包括后人撰写的传记、回忆录、纪念文章、各种文献刊载的谱主简历等)记录了谱主的大量信息,颇有价值。不过,有些传记过于讲究文采,不重视史料的挖掘、整理与利用;有些传记倒是挖掘了不少一手档案资料,但未加以辨析。有些回忆录或记忆文章介绍了谱主的某些不为人知的言行,呈现了谱主的某些侧面;但有些作者未加查证便随性下笔,其可信度堪忧。总之,传记资料在准确性与可信度方面存在缺憾,需要小心利用。

4. 新闻报道

近现代以来,各种报纸杂志对于公众人物的活动多有报道,给后世研究者留下了丰富线索。但是,在交通、通信等并非那么便利的时代,新闻报道在时效性与准确性方面存在不足。研究者需要综合各方资料加以辨析。

总而言之,研究者应当努力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世界中打捞跟谱主相关的各种史料。为此,研究者需要拓展史料采集范围,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挖掘出尽可能多的相关史料。

当前,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与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商业公司或公益团体纷纷将一些珍贵文献制作成数字化文档,构建内容丰富、检索便利的公益性或商业性数据库。公益性数据库方面,主要有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民国图书”“民国期刊”等数字化资源库,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Chinese Republican Period (1911—1949) Collection”(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时期文献)等。商业性数据库方面,主要有上海图书馆的“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包括晚清期刊、民国期刊、中国近代英文报纸、中国近代中文报纸、字林洋行中英文报纸等多个全文数据库),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民国图书数据库”,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的“中国近代报刊库”“民国图书库”“红色历史文献库”,“大成故纸堆”(包括老旧刊、民国图书、《申报》、《顺天时报》、《大美晚报》)等。研究者利用此类数据库,可以十分便利地挖掘到与

谱主相关的大量史料。

当然,目前已经数字化处理的文献毕竟还相当有限,或者有些数据库在标引与检索的全面性与准确性方面做得不够好。如果过于依赖检索数据库,研究者很可能遗漏许多宝贵线索。因此,研究者仍然需要遵循傅斯年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原则,不怕脏不怕累,努力翻阅故纸堆,争取挖掘出更多有用的东西。

此外,间接史料经过转录,“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①,其准确性与可信度比不上直接史料,所以兰克才提出要“对资料持批判态度”^②。因此,研究者在利用间接史料的时候必须常怀批判意识,不能偏听偏信,而是应当多方证实或证伪,争取做到“考而后信”^③。

四、本年谱的进展与不足

笔者通过田野调查、网络搜索、文献传递等多种渠道,充分利用各种公益性或商业性数据库,广泛挖掘和获取了大量直接史料,尤其是林语堂中英文作品、学籍档案、往来信函、书画作品、讲演或访谈记录等,力争全面呈现林语堂的学术活动、成果与影响。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本年谱已经取得了不少重大突破。试举数例如下:

1. 林语堂的学术活动始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时期。但是,中外学术界对该校档案与校园出版物的挖掘远远不够,如历年出版的中文与英文版《圣约翰大学章程》(*Catalogue of St. John's University*),中文与英文版《约翰声》,英文版《约翰年刊》(*The Johannean*)等。笔者在此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新发现。

比如,笔者查到,林语堂于1911年9月入读预科四年级,次年9月便升入文科大一,而非如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所称的在“圣大预备学校读了一年半”。又如,笔者查到林语堂早年用过英文名“Ling Nyoh-daung”(简写为“N. D. Ling”),然后借此在《约翰声》上查到他以“N. D. Ling”为笔名发表的数篇佚文。其中,他在1912年11月出版的《约翰声》第23卷第9期上发表的“Why We Study Chinese”(《我们为何学习中文?》)是目前所见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由此,可以改写当前关于林语堂学术活动之肇始的不正确认识。

2. 林语堂早年曾潜心于索引研究。此前学界只注意到他发表的《创设汉字索引制议》(载1917年10月25日《科学》第3卷第10期)、《汉字索引制》(载1918年1月《清华学报》第3卷第2期)等相关文章。其实,早在1917年5月,他就已经在英文版《清华学报》(*The Tsing Hua Journal*)第2卷第7期上发表了“An Index

① 傅斯年:《史料略论》,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② 陈勇、罗通秀:《西方史学思想导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

③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9页。

林语堂学术年谱

System for Chinese Characters”，即为《汉字索引制》的英文版。

3. 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称林语堂“参加《中国学生月刊》举办的征文比赛，连续三次获第一奖，每次得二十五元奖金，后来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只好停止投稿”。但查阅《中国留美学生月报》(*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即林太乙所称的《中国学生月刊》)可以发现，林语堂其实只获得过该刊1919年11月与1920年1月两次征文比赛的第一名，而且每次的奖金只有15美元。

4. 民国至今，一直有人批评林语堂是抗战的旁观者。但是，通过梳理林语堂旅美期间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亚细亚杂志》(*Asia*)等发表的文章、访谈记录、广播文稿及其参与的各种社会活动，可以清楚地看到，林语堂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在为抗战做贡献。事实上，1945年3月9日，《美亚》(*Amerasia*)第9卷第5期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就很好地总结了林语堂扮演的角色——中国派驻西方的“学术型新闻代言人”。

当然，本年谱在林语堂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方面仍然存在不足。比如，国内机构馆藏的《约翰声》部分期次损毁，还需要到国外机构馆藏中挖掘旧刊。又如，国外机构藏有大批与林语堂相关的档案、往来信函等，包括哈佛大学所藏林语堂学籍资料、庄台公司(*The John Day Company*)档案、赛珍珠私人档案等。这些关键史料急需进一步挖掘和整理。再如，林语堂日记手稿《林语堂自由日记》(1929年1月1日—1932年1月22日)已流入私人藏家手中，急需寻求可靠渠道加以查阅和利用。此外，限于篇幅，笔者未对林语堂著译成果的具体内容进行较为细致的介绍与辨析。这些都是后续研究应当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五、致 谢

在本年谱的编撰过程中，笔者得到了许多友朋的热情帮助。江南大学图书馆的顾烨青先生在数据库利用和史料挖掘方面为笔者提供了巨大帮助。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英文系的陈智淦副教授是林语堂研究领域的新生代专家，但凡在研究过程中有所发现，他就会及时告知笔者，为笔者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中国国家图书馆参考咨询部的蔡成普先生不辞辛劳，利用休息时间为笔者拍摄了《中国评论周报》(24册)的全部目录，林语堂著 *Memoirs of an Octogenarian* (《八十自叙》，台北：美亚书版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的附录——亚瑟·詹姆斯·安德森编的《林语堂英文著作及英译汉书目录表》，以及《约翰年刊》第二卷(*The Johannean, Volume II 1915—1916*)刊登的两篇林语堂英文文章等重要资料。他还为我复印了“小评论”栏目的全部文章。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的傅文奇博士、副教授热心地为笔者提供了安德森编《林语堂英文著作及英译汉书目录表》的原初版本(最初载美国 *Bulletin of Bibliography and Magazine Notes* [《书目与杂志笔记公报》]第30卷第2期[1973年4—6月号])。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最新设立的福建省社科规划基础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为

本年谱的研究与出版提供了充足经费。笔者所在单位泉州师范学院图书馆的领导与同事一直支持笔者的研究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郑锦怀

2018年3月12日

于泉州师范学院俊秀图书馆

目 录

正谱(1895—1976)

1895 年	虚岁一岁	/ 3
1896 年	虚岁二岁,实岁一岁	/ 5
1897 年	虚岁三岁,实岁二岁	/ 6
1898 年	虚岁四岁,实岁三岁	/ 7
1899 年	虚岁五岁,实岁四岁	/ 8
1900 年	虚岁六岁,实岁五岁	/ 9
1901 年	虚岁七岁,实岁六岁	/ 10
1902 年	虚岁八岁,实岁七岁	/ 11
1903 年	虚岁九岁,实岁八岁	/ 12
1904 年	虚岁十岁,实岁九岁	/ 13
1905 年	虚岁十一岁,实岁十岁	/ 14
1906 年	虚岁十二岁,实岁十一岁	/ 15
1907 年	虚岁十三岁,实岁十二岁	/ 16
1908 年	虚岁十四岁,实岁十三岁	/ 17
1909 年	虚岁十五岁,实岁十四岁	/ 18
1910 年	虚岁十六岁,实岁十五岁	/ 19
1911 年	虚岁十七岁,实岁十六岁	/ 20
1912 年	虚岁十八岁,实岁十七岁	/ 21
1913 年	虚岁十九岁,实岁十八岁	/ 23
1914 年	虚岁二十岁,实岁十九岁	/ 24
1915 年	虚岁二十一岁,实岁二十岁	/ 26
1916 年	虚岁二十二岁,实岁二十一岁	/ 28
1917 年	虚岁二十三岁,实岁二十二岁	/ 32
1918 年	虚岁二十四岁,实岁二十三岁	/ 34
1919 年	虚岁二十五岁,实岁二十四岁	/ 36
1920 年	虚岁二十六岁,实岁二十五岁	/ 41